

刘福勤 著

心忧书

《多余的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宗范
封面设计 秦真

心忧书《多余的话》

刘福勤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3万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80515—572—0/K·71

定价: 4.60元

序 言

瞿秋白的狱中遗作《多余的话》和人们几十年来关于它的纷纷争论，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很能反映规律性的、很值得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研究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涉及对瞿秋白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且涉及对现代中国所走道路的认识，进而或能启迪我们察知当前和今后的“中国问题”。

我初读《多余的话》，是在它被当作“叛徒的自白书”来“示众”的时候。学生时代读了《瞿秋白文集》，六十年代初当教师的时候讲授过关于瞿秋白的课程，我心中的瞿秋白是才华卓然、思想深刻的文化巨子，又是唱着“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而就义的烈士，所以，对“讨瞿”文章有反感。然而，没读过《多余的话》，于是仔细读读它，探究一下“自首书”说有无根据。读后，觉得它是瞿秋白的真情实话，认为以前流行的“伪作”说是不对的，但决非什么“自首书”，虽然我当时也认为其中有些“很不该说”的话，同时又觉得作者的真情实话似乎有弦外之音。老实说，读得似懂非懂，心中产生了不少问号：瞿秋白为什么没有象方志敏那样写出一本激昂的遗作而写这自题为“多余”的话？言外之意是什么？被说成“叛徒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我要研究《多余的话》的最初动因。

读过《多余的话》不久，我受到“冲击”和批判，接着是几年失掉自由的生活。被拿作我的“罪状”的，有两条是对我多年前写的一份“交心书”的断章摘引和曲解。这时，我似乎悟到《多余的话》的悲剧之所以产生了。当时我想：瞿秋白就义三十多年后被打成“叛徒”，就是因为他的真情实话被误解和曲解了；到

现在仍然不能容说实话的人，实在可悲可叹。我反复默念《多余的话》的卷首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思索《多余的话》之所讲及其要旨，觉得它决不单是讲瞿秋白自己。自述只是表层，其深层意蕴甚复杂，包括党史、中国革命和根本性的思想文化问题等，而且它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内容的意义在于未来。《多余的话》所讲的历史、心理矛盾和困惑，没有完全成为“过去”，仍然能在某种程度上照见现实。我后来研究《多余的话》时，沿着这些想法作了些开掘。

斗转星移，到了七十年代末，学界对《多余的话》重新评价了。但直到1982年，我看到的论文大抵是讲它的真伪、讲它是不是“错误话”，讲它“光辉”是主要面还是“灰暗”、“动摇”、“退却”是主要面。于是，我想从其重要思想文化意义和教训的方面作些探讨。本拟一面研究思想家瞿秋白，一面研究《多余的话》，却由于别一书稿缠手，只写了一篇《早熟的青年思想家瞿秋白》（后来发表在《学术论坛》1985年第3期上）和本书的第三章。1985年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前后，才把一至十章的第一稿写出来。不过，我的主要观点在1982年的一次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已经作过如下的表述：

“《阿Q正传》的思想文化意义，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有相通之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精神作了精辟分析，其中有些论述关涉《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就瞿秋白自己的思想发展情况而论，‘序言’尚未达到《多余的话》的深度。……《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以往思想的升华，是思想文化伟人瞿秋白之最后完成。虽然有低沉情绪的漩流，但在就义前夕的特殊境况和内疚心理状态下的思想，倒比作者在其热情激扬和政治活动高峰期的思想更深邃、更有启迪力量了，也比三十年代初的思想、比写‘序言’时的思想进了一层，更见其心灵真实。可以说，《多余的话》取助于鲁迅彻底‘反虚伪的精神’，发展了

序 言

瞿秋白的狱中遗作《多余的话》和人们几十年来关于它的纷纷争论，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很能反映规律性的、很值得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研究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涉及对瞿秋白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且涉及对现代中国所走道路的认识，进而或能启迪我们察知当前和今后的“中国问题”。

我初读《多余的话》，是在它被当作“叛徒的自白书”来“示众”的时候。学生时代读了《瞿秋白文集》，六十年代初当教师的时候讲授过关于瞿秋白的课程，我心中的瞿秋白是才华卓然、思想深刻的文化巨子，又是唱着“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而就义的烈士，所以对“讨瞿”文章有反感。然而，没读过《多余的话》，于是仔细读读它，探究一下“自首书”说有无根据。读后，觉得它是瞿秋白的真情实话，认为以前流行的“伪作”说是不对的，但决非什么“自首书”，虽然我当时也认为其中有些“很不该说”的话，同时又觉得作者的真情实话似乎有弦外之音。老实说，读得似懂非懂，心中产生了不少问号：瞿秋白为什么没有象方志敏那样写出一本激昂的遗作而写这自题为“多余”的话？言外之意是什么？被说成“叛徒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我要研究《多余的话》的最初动因。

读过《多余的话》不久，我受到“冲击”和批判，接着是几年失掉自由的生活。被拿作我的“罪状”的，有两条是对我多年前写的一份“交心书”的断章摘引和曲解。这时，我似乎悟到《多余的话》的悲剧之所以产生了。当时我想：瞿秋白就义三十多年后被打成“叛徒”，就是因为他的真情实话被误解和曲解了；到

现在仍然不能容说实话的人，实在可悲可叹。我反复默念《多余的话》的卷首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思索《多余的话》之所讲及其要旨，觉得它决不单是讲瞿秋白自己。自述只是表层，其深层意蕴甚复杂，包括党史、中国革命和根本性的思想文化问题等，而且它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内容的意义在于未来。《多余的话》所讲的历史、心理矛盾和困惑，没有完全成为“过去”，仍然能在某种程度上照见现实。我后来研究《多余的话》时，沿着这些想法作了些开掘。

斗转星移，到了七十年代末，学界对《多余的话》重新评价了。但直到1982年，我看到的论文大抵是讲它的真伪、讲它是不是“错误话”，讲它“光辉”是主要面还是“灰暗”、“动摇”、“退却”是主要面。于是，我想从其重要思想文化意义和教训的方面作些探讨。本拟一面研究思想家瞿秋白，一面研究《多余的话》，却由于别一书稿缠手，只写了一篇《早熟的青年思想家瞿秋白》（后来发表在《学术论坛》1985年第3期上）和本书的第三章。1985年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前后，才把一至十章的第一稿写出来。不过，我的主要观点在1982年的一次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已经作过如下的表述：

“《阿Q正传》的思想文化意义，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有相通之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精神作了精辟分析，其中有些论述关涉《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就瞿秋白自己的思想发展情况而论，‘序言’尚未达到《多余的话》的深度。……《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以往思想的升华，是思想文化伟人瞿秋白之最后完成。虽然有低沉情绪的漩流，但在就义前夕的特殊境况和内疚心理状态下的思想，倒比作者在其热情激扬和政治活动高峰期的思想更深邃、更有启迪力量了；也比三十年代初的思想、比写‘序言’时的思想进了一层，更见其心灵真实。可以说，《多余的话》取助于鲁迅彻底‘反虚伪的精神’，发展了

作者原有的求实崇真的思想，成就了一位没有伪饰的共产党人和文化伟人瞿秋白。‘心智不调’，情绪与理性的矛盾等等，在《多余的话》中的确表露得很明显，但这更见其真。谁没有心理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用革命家的理智和‘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比以往更严厉地去否定‘异己’意识和情感的表现，最后达到了新的超越。他在更高层次上超越了‘文人’的自我、‘脆弱的’自我、委曲求全的自我；提出并试图解决对‘历史的偶然’和必然的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和‘歧路’关系的问题；深刻地触及了中国革命者和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母体文化环境中如何对待文化传统袭因和外来影响的问题，以弦外之音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克服对外依赖性和警惕旧文化魂的复活，独立创造理论思想，消除隐患，发展新文化，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当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从容地走上罗汉岭的时候，他达到了前所未达的思想水平，最后完成了他的伟大人格。”

上面所引的话，是我把《阿Q正传》与《多余的话》，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与《多余的话》相联系，论述它们的思想、文化意义的时候提出的对《多余的话》的总体看法。本书第二至第十章，从几个侧面把上述总体看法展开来论述了，并且对《多余的话》所涉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探考和评论。

《多余的话》具有严整的统序。卷头引语和《代序》篇，讲写作动因和执笔的心境，用“心忧”和“内心的真相”总述要旨和内容；中间五篇，从政治生涯中的心程、意识矛盾、理论“思路”、路线问题、文化素质和心理五个方面展开，自述和自我评析中蕴蓄着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告别》篇是结语，抒写现时心理活动，总说旨归，在永诀的祝福和哀告之中，从历史与现实引向未来。总看整体，或可说是瞿秋白一生的心程，近乎思想自传，只是偏重于自我批判。因为写作环境特

殊，时间仓促，所以笔墨是高度浓缩的，写法简括而婉曲，感情性和哲理性融一，语言表述文学化，含蓄幽隐，言近意远，回肠九曲。因此，对它的研究，必须多面联系瞿秋白一生的经历和著作，才能使它所涉的历史内容和所蕴含的思想显豁起来；必须放射开去，从对瞿秋白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素质等作多方位的考察，对遗作所涉问题作谨细的探考和分析，才能把握其思路和精神，知道为什么那么说，才能弄清其得失，给予公正的评价。我试图用上述方法，并且补充作者所略的、应该予以肯定的方面，以使其自我思想评传具体化，丰富起来，明晰起来，同时说出我的看法。写作中，我感到实现这个意图的难度较大，也许没能较好地实现。

要请读者注意的是，我肯定《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思想发展终结的地位和它所达到的瞿秋白前所未达的真和深，却并不认为它所表现的心理矛盾无可指摘，也不是对瞿秋白思想体系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瞿秋白文化现象作全盘的肯定。本书大部分篇章有对其缺点和失误的评论。这里需要总说一下看法。

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初期寻路人之一，他有首创、开拓的殊勋。他和他的同代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智的核心，来发展文化新力，来指导革命，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历史进程和世界环境使然，也是他们拯救中华民族的热诚、进取精神和雄大魂力的表现。他们开创了新局面，把中国引向了新的进步途程。然而，对于开辟中难免的幼稚、脆弱、困惑和很难解决的心理矛盾，也必须予以重视和研究。他和共产党早期的青年领袖群，与他们同时代的新知识分子一样，是“五四”文化的产儿，他们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吸引之后，搞新文化启蒙的时间太短促，知识积累、理论准备、领袖人才的培育，新生力的积聚，都太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赤色革命”成功所激起的冲动加上中国传统的造反夺权的心理

潜因,使得在以“泰西”为师的几十年中没有找到成功之路的“康、梁”、“孙、黄”的后辈们急于发动中国的“十月革命”,以求掌权和社会改造的速成(孙中山这时也转而以俄为师,改造国民党,建立党军、欲以速胜),而不懂得“中国问题”的复杂特殊性,不懂得中国革命和改造的艰巨性,所以就不可能不受重大挫折而走弯路,不可能不发生各种出乎意料的、怪异的、令人困惑的现象了。领袖们幼稚、脆弱、缺乏独立自主能力,犯“路线错误”等,都由此而发生。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误会”、“偶然”、捉“老鸦”来“做窝”、扮“戏”等等,都在这畸形历史现象之中。

在文化思想上,由于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于“资产阶级文化”笼统否定的观点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也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腐败因素看得太宽泛了,追求纯粹的“无产文化”,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近代世界其他文化思想和新的创造未予重视,甚至发生了盲目排斥倾向。例如,瞿秋白认为“五四”新文化的“娘家”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要发动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对“五四”文化评价的明显偏低,过多过分的否定,则是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文化上扩大化的一种表现。又如他的反“市侩主义”,虽在其主要方面是对的,却也有笼统排斥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表现。还有,他几乎没有论述过如何从西方现代文化取纳新成果的问题。《多余的话》在谈到文艺和列举想再读的文学名著时,作者原来的态度似乎有些变化,但是在理念上仍然没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文化的明显的新认识。所以,总起来看,瞿秋白的文化思路还是限得窄了,难以博取和广泛融会新知,因而他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也就难免偏执,不能取得高效。

对于传统的民族深层文化和典籍文物之优良因素和腐败因

素，瞿秋白一代人没有来得及作全面精深的研究，没有达到高度自觉，因而在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口号声中简单地否定了不应全盘否定的东西，如对中庸、忠恕的笼统否定等；同时，却在外来新名目下，实际上承袭着不应承袭的东西，例如宗法专制主义和内部权力角逐的积因，在“原则”、“纪律”、“路线斗争”等名目下复活。瞿秋白在“国际”影响和指令之下，曾对别人作过火惩办，后来则在几乎同样的方式下，身受其殃，成为新偶像前贡桌上的牺牲。《多余的话》对此有所醒悟，得了“放心”，含蓄地但也“坦白”地对“国际路线”提出了怀疑，开始超越了委曲求全意识，对变化了形态的专制主义略有所识。但对民族深层文化中可借以促进新文化的因素，瞿秋白除了一般地肯定中国人民大众有优良传统之外，没有作过具体分析。《多余的话》在理智上对传统文化仍然持笼统否定的态度。这样，新型文化“先锋”就不是自觉地从母体文化吸取营养、不是自觉地发扬固有血脉的优化积因了，尽管实际上离不开母体文化，实际上在吸取某些营养、发扬某些优良积因。

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坚定信仰，在用来解决“中国问题”时，表现了创造性。但由于思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时间太迫促，他所了解和掌握的知识，相对于这一学说的丰富内容和完整系统来说，的确是初步的，较浅的。因此，难以突破“国际”和“联共”关于“中国问题”的思想框框，难以独立解决理论问题。《多余的话》隐约提出了理论上的独立思考问题，但当时已不可能形成他自己的独立的理论思想体系了。

我作上述分析，决不是苛求瞿秋白及其同代人，不是认为他们当时就应当完善地解决这些问题，而只是想说，现在研究瞿秋白和他的《多余的话》，要注意寻出他们没有解决而后人要去解决的问题。当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时候，研究瞿秋白这位伟人及其遗作《多余的话》的复杂性，可以从正反两面都得

到启示，作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路、开拓的助缘。

本书对整个《多余的话》分篇、分段作了“评注”，一方面是提供一些必要的阅读参考材料，节省读者翻检工夫；一方面就研究者们有不同解释和评论的地方，提出我的看法。综论中已经论及的均从略。

《多余的话》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了不少，但尚无一本专著。本书参考了同行们的研究成果，作了综合性探索和评论，或能作为通向更深入研究的一座小桥吧。

本书可能会有粗陋的地方，观点与同行们有些相异之处，敬请批评。

刘福勤

1987、10、写于南京虎踞北路

目 录

序言	1—7
一、是否被“篡改”问题的考辨	1
1. “伪造”说和“篡改”说本无实据	1
2. 与狱中诗词比较	2
3. 与狱中致郭沫若的信比较	5
4. 与入狱前的诗比较	7
5. 与入狱前的散文比较	9
6. 符合瞿秋白实况和思想逻辑	14
7. 从语言风格和表述方法来看	16
8. 原稿本：李克长的报道和杨之华的回忆	18
9. 结论	19
二、“心忧”、“乱谈”和“告别”	
——作意探讨	21
1. 多种说法	21
2. 一无所“求”	24
3. 怎样看待一个“假定”？	25
4. 怎样看待过分自贬和低沉情绪？	27
5. 并非“多余”的“心忧”话	29
6. 因苏区被毁、革命受挫而“心忧”	32
7. 因党存在多种病状而“心忧”	33
8. 完成最诚实纯洁的爱情是作意之一方面	37
三、“偶然”和必然，“误会”和“羸弱的马”	
——政治生涯的“真情”自述	41

1. “读书种子”和饭碗问题……………41
2. 从“厌世主义”到新的“好奇”……………4³
3. 对当领袖之前道路的肯定……………46
4. “误会”主要指什么?……………51
5. “历史的误会”说之演变……………52
6. 并非纯属“偶然”……………55
7. “犬耕”和“羸弱的马”……………57
8. “历史的误会”说之思想意义……………60
9. “历史的误会”说之缺点……………63

四、复杂的人自剖复杂意识

- 关于“脆弱的二元人物”……………65
1. “二元”含义之转变……………65
 2. “理智”……………67
 3. “潜伏”的“异己”意识……………69
 4. “二元化的人格”与特定政治背景……………72
 5. “教训”的意义和“二元”说的失误……………76

五、“无从改变”、“歧路”和“退步”

- 关于“思路”……………81
1. 实事求是，肯定自己的“思路”……………81
 2. 真诚、清醒、深刻的自我批评……………84
 3. 深层意蕴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启示……………86

六、“实逼”与“调和”

- 关于在陈独秀时期党内斗争中的态度……………93
1. 三个要点……………93
 2. “好汉”和“实逼”……………95
 3. 反机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支柱……………99
 4. 公平看待失败的责任，温和表现自主意识……………104
 5. 在“土地革命”问题争论中“调和”……………107

6.	在鲍罗廷和罗毅指导方针冲突中“调和”	110
7.	在中共中央改组问题上“调和”	113
七、正确、全面而深刻的历史主义反思		
——	关于“盲动主义”	116
1.	刘清一个界限	116
2.	讲清错误的特质	119
3.	谁“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122
4.	对“广州暴动”后的错误承担主要责任	128
5.	关于错误的纠正	131
6.	结束语	133
八、“瞿秋白主义”和“最终结算”		
——	关于立三、王明及“国际路线”	137
1.	“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	137
2.	“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	142
3.	“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147
4.	“不同的政见”和“最终结算”	154
九、文化基因和心理素质剖析		
——	关于“文人”	159
1.	“文人”的概念	159
2.	瞿秋白为什么说自己“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160
3.	严肃自剖和过分之处	163
4.	关于“我”和“剧中人”	166
5.	关于知识结构及其缺陷	171
6.	超越了“文人”，进到了新境	177
十、《多余的话》评注		
1.	《何必说？——代序》	179
2.	《“历史的误会”》	185
3.	《脆弱的二元人物》	205

4. 《我和马克思主义》	214
5.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228
6. 《“文人”》	243
7. 《告别》	254
十一、《记忆中的日期》注	273
后记	286

一、是否被“篡改”问题的考辨

1、“伪造”说和“篡改”说本无实据

自从《多余的话》问世到六十年代初，近三十年中，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坛公开发表的意见，大抵说它是伪作，或者说被篡改过的，“以讹传讹，歪曲了历史”的。“伪造”说和“篡改”说，本无确实根据，其产生原因大致有四：

（一）《多余的话》最初是由国民党的刊物《社会新闻》摘其被认为可用作反共宣传的部分刊登的。

（二）非左翼刊物亦非国民党刊物的《逸经》半月刊于1937年连载《多余的话》全文之后，也发表过贬损瞿秋白和企图借以瓦解革命队伍的文章，如断章摘引“希望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等话，故意歪曲说是对共产青年“执迷不悟者”的“当头棒喝。”^①左翼人士郑振铎等去看《逸经》所依的《多余的话》底稿，发现并非瞿秋白手迹。于是一些人以为更有“理由”说是伪作了。

（三）《多余的话》中有一些过于严厉的自贬自责之辞，格调较低沉，这与人们常看到的瞿秋白的政论、文艺评论、杂文的风格很不相同；所表现的心理状态、情绪和某些思想，与对瞿秋白了解不深的人心目中的情形不相符。这也使一些研究者疑为伪作或被肆意篡改过。

（四）手稿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持“伪作”说的人以为很“硬”的一条“理由”。

其实，前两条只可以作为怀疑的理由，却都不足以作为断定其“假”的根据，把第三条作为“伪作”证据的人，没有充分注

①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三十四期。

意瞿秋白思想、性格、心理的复杂性和他的作品的面面性、风格的多样性。这两种表面性和片面性碰在一起，就觉得《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形象“不符合”。第四条不仅不是“伪作”说的“硬”理由，反过来也可以证明“伪作”和“篡改”的说法不可靠。况且，如果以有无手稿作证来判断一篇作品的真伪，那么无论谁的文集都得被大量删减篇章了。

现在，已经极少有人认为现存《多余的话》是国民党凭空假造的了，但是这篇作品是否被“篡改”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下面，我作一些考辨，将证明《多余的话》确系瞿秋白遗作，即使文字上有某些改动也无关紧要，不可谓之“篡改”。

2、与狱中诗词比较

瞿秋白在狱中写了些诗词，其中有些是存有手稿的。《多余的话》所表现的思想情绪与狱中诗词是一致的。

写给国民党三十六师军医陈炎冰（后来，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浣溪沙》词曰：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潮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多余的话》中怎样说的呢？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空空洞洞的，……

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身心力在我不感兴味的政治上。

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月亮的光似乎比以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两相对照，不是可以看出二者的意蕴和情绪的一致吗？就连某些用语如“空空洞洞”与“万事空”、“枉费了一身心力”与“枉抛心力”等也几乎相同。对“空”、“枉”等所表现的思想